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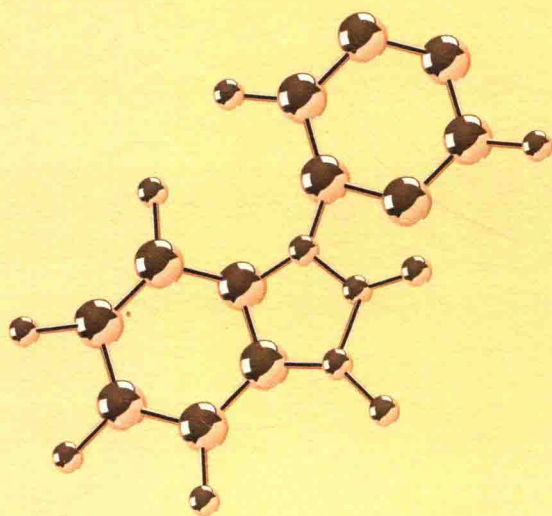
問學

思勉青年学术集刊

第3辑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编

学问的道路，起于问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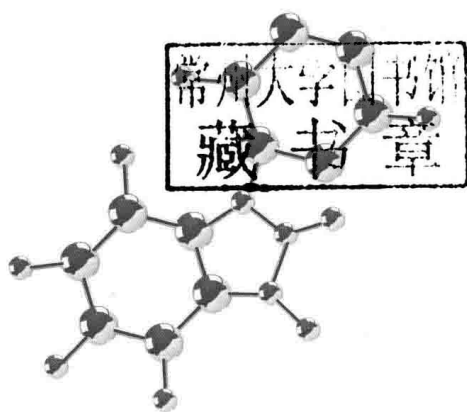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學問

思勉青年学术集刊

第3辑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学:思勉青年学术集刊.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309-13666-1

I. 问… II. 华…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3467 号

问学:思勉青年学术集刊.第3辑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编
责任编辑/王汝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33 千
201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666-1/C · 363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问学：思勉青年学术集刊

执行主编

倪春军 张春田

编委会

樊波成 范丁梁 惠春寿 蒋华杰 朱佳峰

刘彦文 马华灵 倪春军 徐 进 张春田

学术委员会

陈大康 刘永翔 茅海建 沈志华 谭 帆 童世骏 王家范

许纪霖 严佐之 杨国强 杨国荣 杨奎松 郁振华 张济顺

目 录

特稿

施蛰存先生佚文辑考 / 金传胜 卢婷婷 1

名家访谈

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 侯体健采访整理 15

——王水照先生学术访谈

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专题 【主持人 倪春军】

词章之学、文史之学与文章学 / 常方舟 35

——兼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章学的建立

唐代萧李集团的师学传承与古文思想 / 张超 47

论秦观“成体之文”的散文思想 / 唐苗 79

王应麟词科程文的体式分析：以制、表为中心 / 戴路 97

章法义例与行文逻辑：《项脊轩志》文本创作之考察 / 宋荟彧 116

小说研究专题 【主持人 张春田】

云霞满纸 / 朱锐泉 126

——《醒世姻缘传》中譬喻使用概说

绎新籀古：晚清闽籍学人小说观刍论（1895—1911） / 李阳 142

“集团主义”的小说远景 / 李国华 175

——论茅盾《子夜》

《青春之歌》与革命的现代性叙事 / 康富强 191

“逃离与追寻”的空间书写与身份认同 / 王嘉慧 203

——论文珍的城市小说

诗意图：杜诗的“跨媒介”传播 / 刘晓亮 213

——以《江深草阁图》的历代传衍为中心

论乾嘉浙西赋学的兴盛与特点 / 莫崇毅 227

社会性别的越界与晚清观剧诗创作 / 李碧 239

创化论与领袖权 / 张历君 258

——论瞿秋白与葛兰西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接受

启蒙的焦虑 / 郭诗咏 288

——重读朱自清的早期作品

“史”的必要、“料”的危险与“当代性”特征 / 李强 313

——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思考

学术通讯

“中国抒情传统”论述再反思 / 张春田 徐承 等 325

——“思勉清音”青年学者著作研讨纪实

地域、集团、文体与文学 / 乐优 346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17 年研究生暑期学校综述

施蛰存先生佚文辑考

金传胜 卢婷婷*

内容提要: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施蛰存全集》，全面搜罗了施氏已刊及未刊的文学作品及学术论著。但是，施蛰存先生的佚文散珠难拾，有待进一步发现。本文辑录了《略谈抗战文学》《文化抗战之意义》《两个犹太人》等多篇施氏集外佚文，并略作考证梳理，以见其文学史料价值。

关键词:施蛰存 佚文 辑考 史料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施蛰存全集》。嗣后，有关施蛰存先生的史料陆续被披露。就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先后发现的施氏集外作品已有10余篇。为尊重发现者的“首发权”，有必要先将前人发现的情况简要介绍如次：

1. 词作《蝶恋花》(1首)、《南歌子》(2首)，唐建国发现并撰文《施蛰存轶作〈无想庵小令(词)〉》，刊于《松江报》2013年3月8日。

2. 新诗《玉女之歌》、《我期待》、《镰刀的三个季节》、《卖梦》、旧体诗《为毕业班女弟子题纪念手册》、散文《纪梦》等，杨新宇发现后撰《新发现的施蛰存佚诗和佚文》，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 作者金传胜(1988—)，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卢婷婷(1991—)，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3. 小说处女作《纸钱》、旧体诗《重游西林塔》、散文《闻名不如见面》¹《人与文》，由李朝平发现并作《新发现的施蛰存小说处女作及其他》，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

笔者最近在查阅民国刊物时，也发现了施蛰存先生的几篇集外佚文，既为《施蛰存全集》所失收，又未见沈建中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著录。故辑录如下，并略作说明。

—

由于抗战时期局势动荡，文化名人流离迁徙不定，各地的战时出版物大多刊龄较短，流传不广，致使许多文学史料长期散失，湮没不彰。孔刘辉的《施蛰存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考论》一文（以下简称孔文）重点探讨了施蛰存抗战阶段的文化活动，论及了施氏的多篇佚文。比如文中有“1938年初，刚到昆明的施蛰存即在当地报刊发文，指出当前文学已出现‘粗制滥造的倾向’”²的表述，然刊名与篇名皆语焉不详，大概作者并未寓目原文。笔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这篇佚文《略谈抗战文学》。它写于1938年3月6日，发表于4月1日昆明《时代轮》月刊创刊号，署“施蛰存”。该刊编辑有唐京轩、石天薰、祁学仁、杨瑾如、杨瑜如、阮以仁，由时代轮月刊社出版。据创刊号《本刊重要启事》可知，该刊前身为《新蕊》月刊，系纯文艺性质刊物，出版至2卷1期，因“抗战正殷”，“同人等深觉纯文艺之不能单独负此巨艰”，遂改为综合性刊物并易名。同期《编者后记》特意提到了施文：“于此有应特别声明者，即施蛰存先生能于百忙中为本刊撰稿，题曰：《略谈抗战文学》，立论之颖异，观点之正确，实与普通一般谈抗战文学者有别，学者发论，不同凡响，际此抗战正殷，先生此文，弥足有其真价存焉。”全文

1 此文在沈建中《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中实已全文载录，参见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2 孔刘辉：《施蛰存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第49页。

如下：

略谈抗战文学

抗战文学并不是文学中的一个门类，而是文学上的一种倾向。自从“九一八”而后，这种倾向在我国文学中逐渐地明显起来。直到现在，军事政治的全面抗战发动了，文坛上的业绩也全然都是抗战作品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抗战文学的旗帜底下所已经看到过的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也尽有不少是可以发生问题的，这所谓问题，据我所感觉到的，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作者底抗战意识不很准确，以致他底作品往往歪曲了所应有的意义，还有一类是因为作者在他底作品中表现了太过分或太不足的抗战情绪，以致读者对于他底作品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因消灭了它应有的效能。

抗战文学，或称国防文学，我们若单从字面上去寻求意义，则国防文学这个名称所表示的范围似乎比较的广大些，而实际上，照现在一般人应用这两个名词的习惯看起来，则是同样的东西。但我们所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国防文学或抗战文学，它们都并不是战争文学（War Literature）。原来战争文学这个名词，是在欧战时才普遍地被应用起来的，当时参加欧战的许多作家，无论是在协约国方面的或是在德国方面的，都共同地对于那一场战事底残酷感觉到厌恶，所以在战事进行的时候以及战事停止了以后的五年乃至十年间，在战争文学这个标帜底下所产生的欧洲文学作品，其内容可以说大多数是充满了悲观的非战思想的。后来同情于共产主义的巴比塞底小说《火线下》如此，意象派诗人亚尔亭顿底诗《大战意象诗抄》也是如此。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如何呢？我们固然是一个厌恶战争的民族，但目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横暴的侵略之下，我们却不能再避免战争了。我们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但是这一回，我们是甘于去领受这种残酷。我们希望在这种苦茶吃尽了之后得到的是甘荠。所以，我们的抗战文学，其内容决不能同于欧洲的战争文学。这一句话，若是解释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抗战文学家决不能从战争的残酷这方面去寻求题材。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抗战文学也不应该雷同于欧洲的那些爱国主义的文学。自从欧洲列强互相争夺殖民地以后，各国的文学家都帮助了

自己的政府向人民宣传爱国思想，而这种爱国思想的背后却隐伏着两种危险的元素，第一是妄自尊大的恶癖，第二是侵略邻邦的野心。一个作家若是有意无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这种思想，那么他必然会得跟随着他底政府走上帝国主义者或甚至法西斯蒂的大道上去了。我们试举出四个欧洲作家来，就可以说明了这种爱国主义文学的危险性来：（1）法国的都德（Alphonse Daudet）（2）英国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3）意大利的邓南遮（D'Annunzio）（4）意大利的马里内蒂（Marinetti）。从都德开始的爱国思想逐渐地变本加厉起来，就会成为马里内蒂而做了慕索里尼手下的文化侵略者。在我们目下的抗战文学作品中，暗示读者以侵略邻邦之野心的现象当然还不会有，但是暗示读者以妄自尊大的恶癖这个现象却有时也可以发现一点了。

在一次败仗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好些描写日军残暴的作品，在一次胜仗以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好些非常得意的炫胜作品，前者是无意间把敌人的战斗力夸张了，后者是无意间把自己的骄气养成了，这就是我所耽忧着的作者抗战意识之不准确，因而使他底作品歪曲了所应有的意义。

至于一个作家在他底作品中表现了太过分或太不足的抗战情绪，以致读者对于他底作品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个弊病，小半固然由于上文所说的抗战意义不准确，而一大半则不能不归咎于作者底文学技巧之不高明。文学技巧之所以不高明，这里边也可分析出三种理由来：（1）没有抗战生活的真实经验，（2）没有一种对于特殊生活的想像力，（3）根本的没有文学修养。

在正常的时候，我们已经要求一个作家必须尽量地把他底生活经验纳入于他底作品，而在现今这种特殊时代，一个作家要在他底作品中表现出各种人的特别生活，尤其非自己先有这种特殊生活的经验不可。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得出，自从抗战以来，一切安居上海租界，香港殖民地或武汉长沙等遥远的后方的著名作家所发表的作品，没有一篇比得上一个不知名的，从来没有成为文学家而这次却身在炮火中的士官或报馆访员底随意抒写的报告。倘若有人曾经读过几个月之前的国闻周报中有一位亲自参加轰炸日本司令舰出云号的空军将士的那篇自述文，就不难感觉到没有真实的

抗战生活的作家该是如何的苦闷了。

但是在这个英雄的时代中，我们的作家难道因为自己没有去经验真实的抗战生活的机会或勇气，而甘于缄默地搁笔了吗？不，决不！非但他自己不肯缄默，就是我们也不愿意他缄默下去。即使在这样现实的时代中，一个作家底笔还可以在想像的园囿中去驰骋。《伊里亚特》和《峨特赛》是两部大史诗，荷马在这里边灌输了多少想像的材料，然而它们一方面是“诗”，另一方面还不失其为“史”。每一件抗战文学作品，它的“诗”性与“史”性是否冲突，全都要决定于其作者对于抗战时期的特殊人生底想像力是否丰富和确当。近来我看了许多描写后方人民生活，伤兵医院，被日军占据的区域……的文章，总觉得那些作品中的人物，除了对话中间有一点抗战的影子之外，其余一切生理心理状态，都还像是平时的人物。这就是我所谓作家对于特殊生活的想像力还不够的缘故，其弊病则是使他底作品令人有欠真实之感。

因为我们目下正在个危急的时代，人们要求兴奋，要求对于抗战有一个澈底的认识，所以抗战文学作品在后方还是很需要的。因为有急迫的需要，于是供给者中间遂不免有粗制滥造的分子，而介绍者也不免逐渐降格相求。在抗敌救亡的旗帜下，只要能胡诌一个故事，几句口号，写出来被刊印在一张八开的大报纸或三十二开的大杂志上，就成为作家协会中的一位作家了。这个现象，现在也是任何人都可以觉察到的。然而，我们倘若想一想这些作品所渐渐地给予读者的失望，以及这些作家将来的造诣，就不能不替抗战文学的前途悲观了。

现在，我应该结束我这篇小文了。我的意思是，在我国现在的情形之下，抗战文学决不是临时的社会产物。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抗战文学作品，正如一切应时文章那样的，成为暂时流行性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抗战文学作品，若不是抗战实生活底一种文学的纪录，便是渗透了真实性的一种对于这个特殊时期中的人生的想像的写照。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抗日战争总有一天会停止，但我们的抗战文学却决不会随着战争而亦结束掉的。它本身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主潮，现在的倾向，就是将来的结果，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们对于目下的抗战文

学，也不能不加以一种严格的检讨。

(廿七年三月六日)

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施蛰存指出一些所谓的抗战文学存在着两类问题：一是抗战意识不准确，二是“表现了太过分或太不足的抗战情绪”。针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抗战文学或国防文学并不是战争文学。因为欧洲的战争文学的“内容可以说大多数是充满了悲观的非战思想的”，而中国的抗战文学家“甘于去领受这种残酷”，“决不能从战争的残酷这方面去寻求题材”。同时，作者对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也有所反思，提出“这种爱国思想的背后却隐伏着两种危险的元素，第一是妄自尊大的恶癖，第二是侵略邻邦的野心”。若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一位爱国作家可能会成为帝国主义与法西斯的文化帮凶。这在西方文学史上已有先例。虽然在中国目下的抗战文学中，还没有“暗示读者以侵略邻邦之野心的现象”，“但是暗示读者以妄自尊大的恶癖这个现象却有时也可以发现一点了”。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将其主要根源“归咎于作者底文学技巧之不高明”。随后从“没有抗战生活的真实经验”、“没有一种对于特殊生活的想像力”、“根本的没有文学修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作者强调即使没有真实的抗战经验，作家们也可凭想象力来补足，只要具有丰富而确当的“对于抗战时期的特殊人生底想像力”，便能实现文学作品“诗”性与“史”性的统一。文章最后表示，抗战文学不应是“应时文章”和“暂时流行性的东西”，粗制滥造的作品不仅令读者失望，而且会对将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当时正值抗战初期，秉持精英主义文学观的施蛰存却已敏锐地觉察到抗战文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的目的并非全盘否定抗战文艺，而是希望通过检讨不足，倡导正确的抗战意识，维护文学的艺术价值。可这样的用意并不能得到左翼文化人的充分理解。此文发表后，很快便有针锋相对的反驳意见。4月10日、17日，《云南日报》刊出君羊的《〈略谈抗战文学〉质疑》一文，针对施文进行论争，批评其把抗战文学当成下流作品，“当成是文学中的一种恶劣倾向，就如他们的贱视救亡工作那样”¹。另据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

1 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记载，同在10日，施蛰存还在云南《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客座臆谈》，对“再抗战下去”，“抗战文学作品会得愈加低劣下去”的观点表示赞同。¹

二

孔文曾引用了施蛰存的《文化抗战的意义》一文，据此分析施氏“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文化立场”²。此文原载1939年2月15日昆明《新云南》半月刊第2期，署“施蛰存”。目录页的标题为《文化抗战的意义》，内文却题作《文化抗战之意义》，似应以内文为准。由于该文是研究施蛰存抗战时期文化观的重要文献，兹将全文整理于此，以飨学界：

文化抗战之意义

自从前年“八一三”对日全面抗战展开以后，差不多全国各党各派的文化人都在各尽各的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军事，政治或文化上的抗战力量。文学家写出许多诗歌，小说，或剧本，画家画出许多惊心怵目的宣传画，新闻记者记录下许多悲壮的或沉痛的战史，凡此种种，都是用以表现日本侵华军的暴行或激励民众的同仇心的。但是，如果把我们的文化人在“八一三”以后的一切文化活动，单单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抗日行为，那还是太狭隘了一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目前的文化动态中找出另外一种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对于过去的文化的抗战。

这里所谓过去的文化者，我的意思是指的“八一三”以前的一般的文化形态。自从五四运动到“八一三”，这一个时期中的中国文化是一大盘杂碎。跟着政治的和社会的各种势力之消长，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月内的中国文化分为五种成分：（一）封建主义的，（二）民主主义的，（三）三民主义的，（四）泛系主义的，（五）共产主义的。这五种成分，在过去二十年间，没有一种能够整个地统治了中国文化，也不曾有一种成分能够壁

1 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第236页。

2 孔刘辉：《施蛰存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第49页。

垒森严地在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化中自成一个坚强的系统。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化，实在只是在这五种成分底继续不断的互相排荡中构成为各种姿态。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决不能被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所统制的，但是，它如果永远是游离着，呈现了一种五角六张的姿态，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弱点。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所统制了的民族文化固然足以使民族精神日陷于衰退，而游离性的民族文化更足以抬致民族精神的涣散。过去二十年间，我们的文化人各自为着自己的信仰而努力，在一种相当的保持均势之下，我们的民族精神幸免于衰退之厄，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因为文化人的信仰多歧，使我们的文化不能成为一整个坚强的个体，因而民族精神遂免不了有涣散的现象。

“八一三”以来的抗战，在文化这方面，也展开了一个新现象。一切文化人的信仰都集中在抗敌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一切文化活动都是为了抗敌救国。在以前是信仰不同的两个人，现在成为同志了。而这个共同的目标并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所强迫构成的。在一个民主主义精神的共同目标之下努力着而构成的文化，必然是一整个的——那即是说，毫无游离性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民主主义的文化，现在虽然方具雏形，可是已经使我们的民族精神振奋起来，集中起来了。

不管政治机构变化到怎么样，也不管社会组织变化到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民主主义的民族，这是无可否认的。民主主义的精神，无论在政治上，宗教上，或文化上，我们大概都可以指出它一个特点来。那就是：它是天下有道则隐，无道则显的。在比较安定的社会中，民主主义者，没有抗争的对象，它也就无从自己表现，因之人们涵泳于自由精神浑溢着的社会中，反而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在一个动乱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一个被外来的暴力所威胁着的社会中，民族主义的精神才如黑夜天空中的花炮一样闪撒着它的光芒。我们中华民族在每一次国难的时候，都曾表现过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从历史上可以覆按的事实。

所以，我在这篇小文中所要指出的，乃是这一次的抗战，在文化

遍¹方面，除了抗日以外，同时还是在向过去的那种游离性的文化抗战。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过去的那种足以使民族精神涣散的文化活动。我们现在已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目标：抗敌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之所以可贵，乃是因为它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构成的，而是整个民族一致地选择定的。

我们既已明白了惟有在这样的一个全民族共同的目标之下产生出整个的民族文化，那么，在找到另一个更适当的共同目标之前，我们应当竭力抓住这个目标，而不为种种诱惑或诡计所动摇。我们这回的抗战，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个结束的日子，但抗敌救国这个共同的文化目标却不应该跟着战事而结束。民族的仇敌一天存在，则这个共同的目标也一天存在；共同的目标一天一天地存在下去，则民族文化也一天一天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从事于文化事业者的信条。

三

1946年3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3版《民国闲话》副刊登载了一篇《两个犹太人》，署“蛰存”。该副刊主编署“苏风”，应即著名报人姚苏风。因“蛰存”系施蛰存常见笔名之一，且考虑到姚、施两人早在30年代就已结识，时有过从，故可断定此文为施蛰存所写。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两个犹太人

日来街谈巷议大家都集中讨论东北问题，我们对此严重非凡好像内外不分的问题，任何人总知道它底严重程度。

我们不论东北底风云如何吃紧，以及莫斯科电台如何制造新的借口（联合社伦敦二十四日电），甚至再有更严重的发展，我们总应该稍安无躁地静候政府用外交方式去解决。

事态底酿成和演变，我们不能不埋怨那扶持我们的强大的盟邦，为何

1 “遍”，疑当作“这”。

在雅尔达¹会议要来一个喧宾夺主的秘密条约，替我们断送了许多为要争取胜利而不得不委曲求全去忍痛放弃的权利？

我们要回溯一次二次大战底原因，甚至要推想三次大战的危机，总要切齿痛恨那穷兵黩武的祸首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他们仇视民主，蹂躏自由，并曾摧毁真理和正义，他们底覆灭诚然是理所当然。然而养成两大祸首的还有他们幕后的人物，在那里运筹帷幄，操纵把持，大有把整个世界玩弄于掌上之概。

我们可记得那把持了法国经济的法兰西银行吗？法兰西银行不独是法国经济的权威，就是整个欧洲，整个世界，恐怕也逃不了她底掌握。法兰西银行底命运为二百股东所操纵，二百个股东又为十五位董事所把持，其中尤以那世袭了八十个年头的劳斯伽尔²为最有力量。据说他有儿子五个，分住于英美德义日的首都，分头管理并把持各大强国底金融，也更借此来决定近几十年来的世界大势。

劳斯伽尔曾著一书，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为重心，打算把这个世界化成一个经济单位，像一个大托辣斯的组织，总事务所将设于犹太故乡。他认为经济可以决定一切。经济问题既经解决，也当然可以决定政治底动向。据说威廉和希特勒之掀风作浪，背后皆有这种势力的推动，在先，它还能驱策整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向他们低头哩。

当劳氏著作发表之后，正在按步推行之际，他底公司伙计名叫赫尔Hall者，（他和其主人一样的是法国籍的犹太人），窥得了他的主人底远大计划，觉得毛骨悚然，他为另一个阶层打算，随即以其主人底计划为对象，而拿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也来著书立说，预备把世界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托辣斯，总事务所也准备设于犹太故都。他和劳斯伽尔斗了多年的法，因为他也有转移经济局势的力量，他能怂恿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迁就苏联，更可以教他她们互相摧残。

这不是神话或预言，却是一种具体的经济方案。原来在二十年前我在

1 “雅尔达”，今译为“雅尔塔”。

2 疑为梅耶·罗斯柴尔德。

某一个教会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位美籍教师曾经把这两位先生底经济名著英文版本介绍给我们说：“将来的世界，恐怕逃不了这两位犹太人底掌握吧！”他们底著作及其计划，早已成功了颠扑不破的势力。可惜因为时间过长，已经记不清这两本名著底名称及出版的地方。假使有人能提出原本来研究，使得大家能窥其全豹，则对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或皆可以一目了然，不必再惊惶失措了。

按，上文所提到的“二十年前我在某一个教会学校求学”中的“教会学校”，当指杭州之江大学。1922年秋至1923年初春，施蛰存曾就读于该校外国语文系。后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为校方所不喜，自动辍学”¹。由于时间过长，施氏已经忘记了当年美籍教员所介绍的两本经济名著，但对两书的观点与价值基本认可，意欲推荐给读者研读，以使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世界的经济局势及受金融操控的政治走向。

四

施先生曾说：“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第一扇是文学创作，第二扇是外国文学翻译，另外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与碑版文物研究两扇窗子。”施氏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译作一般都会附有“译序”或“译者致语”、“译者题记”、“译者引言”、“译跋”、“译后记”、“译者附记”等，记述其译介的初衷与由来，也会对作品进行解读与阐释，显示了一位杰出翻译家的独具慧眼。正如有论者所言，“有的是对作者生平轶事或所属国家文学史的介绍，有的是对作者创作经历或作品历史背景的描述，有的是对作品艺术价值和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一篇‘题记’或‘译序’就是一篇高质量的作家作品论”²。这些文字绝大多数已收入《施蛰存全集》，但也有失收的情况。

1 施蛰存：《自传》，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二卷《北山散文集》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5页。

2 林大津主编：《福建翻译史论2 现代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6页。